

—— 19世纪30年代在华
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研

打开“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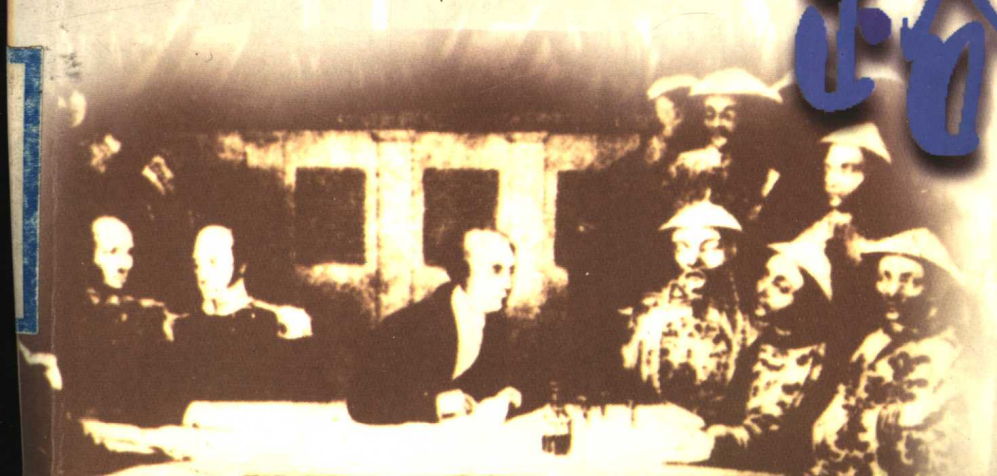


通商

■ 郭小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之路



打开“自由”通商之路

—— 19世纪30年代在华西人对
中国社会经济的探研

郭小东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书 名	打开“自由”通商之路 ——19 世纪 30 年代在华西人对 中国社会经济的探研
作 者	郭小东
责任编辑	王 宁
封面设计	张力平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6.75 印张
插 页	1 页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3001-7/F·446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陈胜舜

19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注重的时段。

就中国史的研究而言，19 世纪 30 年代，是古代史与近代史的“结合部”。这种“结合部”，往往可因其在历史转折中的重要性，而受人关注；但也每每因其处于两大历史时期的“夹缝”中，而被人忽视。中国的这一时段，不但是滞留在中世纪的大清帝国，“国运”继续衰落的时段，而且是已进入近代阶段的西方势力，对华冲击明显强化的时段；不但是罪恶的鸦片战争，即将发动的前夜，而且是古老的中国，将要步上特殊的近代化道路的前夕；不但是中国传统的对外交往体制，正受到日益严重的侵削的时段，而且是西方势力为实现对华“自由”通商，而进行的各种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的时段。因此，要更好地认识古代中国的终结和近代中国的开端，要更确切的把握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和近代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要更有效地了解中西交往的变化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变迁，要更深入地探析鸦片战争和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等等，都有必要加强对 19 世纪 30 年代这一特殊时段的研究。

郭小东同志的《打开“自由”通商之路——19 世纪 30 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研》一书，本着取用新材料、研求

新问题的治学精神，客观求实地对 19 世纪 30 年代这一重要时段，在广州口岸长期居留的西方商人、传教士、官方人员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窥探、研究，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分析说明，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可喜成果。这部著作原系郭小东同志的博士论文，小东同志在中山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期间，被派往境外工作。他放弃了在境外工作的优越条件，回校继续攻读在职的历史学博士学位，既教学，又学习，不辞艰辛，不图近利。其博士论文之写作，历时五载之长。论文答辩时，受到了来自北京等地的答辩委员们的普遍好评，被认为是一篇近年少见的博士论文。现在，其书稿又获广东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得以出版，作为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打开“自由”通商之路》在选题上具有明显的新颖性，同时，也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就中国而言，19 世纪 30 年代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西方对华冲击的强化问题。对这一问题，虽然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中国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但多数都没有得到展开，甚至往往被一带而过。相对较为展开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该时期的鸦片走私问题、西方对华发动战争的军事准备等几个方面。从总体上说，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仍是颇为单薄的，存在着不少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因此，郭小东同志的这部著作，以这一时期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查研究作为论述对象，比之前人，坚实地向前跨进了一步，成为这一课题研究的新起点。

当时的在华西人，堪称西方对华冲击的“尖兵”。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代表了当时西方对华研究的最高水平。在他们对整个探研活动中，对社会经济的探研又居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这与当时的西方急于打开中国市场，急于把中国纳入以他们为中心的國際经济政治秩序之中这一基本目标，又是正相一致的。他

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研，构成了当时中西方之间交通、碰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这方面的探研活动，与鸦片战争的发动以及战后带来的后果之间，也有着至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这么说，要有效把握中国历史的演变进程，就必须切实了解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之间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要切实了解古、近代中国的转折点，就必须加强对 19 世纪 30 年代这一重要转折时期的研究；要加强对 19 世纪 30 年代的研究，就必须深入探求该时期中西交往、冲突的情况；要深入探求该时期的中西冲突情况，又必须就该时期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研进行积极的研究。郭小东同志的这部著作，对这方面所作的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近代之间这一重要历史转折点，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时至 19 世纪 30 年代，在华西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比以前大幅度增加。这些著述和以前来华耶稣会士的撰著，已有明显不同。伴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海外殖民扩张活动的疯狂展开，此时在华西人看待中国事物的心态已经明显改变，分析中国事物的标准亦不同以往。他们打开中国市场的欲望显得格外强烈。他们的撰著，诸如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林赛（胡夏米）等所撰的《“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报告》、郭士立所撰《沿中国海三次航行日记》、麦都思所撰《中国的现状和展望》、马儒翰所撰《中国商业指南》、马地臣所撰《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和展望》等等，都在当时的西方产生过形形色色的明显影响。要有效了解当时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探研的切实情况，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他们所撰写的有关著述，以便从第一手材料入手，进行客观翔实的分析研究。郭小东同志这部《打开“自由”通商之路》，所征引的原始文献、所使用的第一手材料，可以说是较为丰富的。书中使用的大量材料，都是作者在广泛搜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英文原著系统认真、逐张逐页的阅

读，再从中爬梳整理出来的。这些材料，绝大部分属于首次被翻译、被运用的“新材料”。同时，对近年被翻为中文的一批重要史料，如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胡滨译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等等，该书也进行了认真的剔选和运用。在这方面，作者所花的时间、精力及其在此所表现出来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是足以令人钦佩的。

《打开“自由”通商之路》一书，实际上是从一个重要方面，涉及了中国是如何从“传统”走向“近代”、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这一重大课题。这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复杂的课题。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一条非常崎岖曲折的道路上推进的，中国的“开放”，也是在一种相当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围绕这一课题的研究，必须以客观求实、一丝不苟的态度进行。诸如简单化地“贴标签”，或背离历史实际的主观推论，都不可能得出真正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打开“自由”通商之路》一书所作出的分析、所形成的观点基本是平实公允的。因为这些分析结果都是建立在当时在华西人所撰有关著述基础之上的。在当时“夷夏之防”甚为严密，中国又罕有人能阅读英文资料的条件下，这些西方写作者几乎无须担心他们所撰著述会给中国人得到或看懂，在行文中，也几乎不必作任何的掩饰。对他们如何对中国社会经济进行探查，使用了什么手法，去了什么地方，接触了什么人，了解到了什么东西，形成了什么看法，得到了什么结论等等，往往都是直笔书来。文中所体现的，都是他们的真实做法与真实想法。在这么一批透明度颇高的文字材料之下，当时在华西人的心态、行径、思维可谓显露无遗。建立在这种材料基础之上，对当时在华西人的探研活动所进行的分析，只要是以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进行的，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比较经得起检验。

正是以当时在华西人的撰著等原始材料为分析基础,《打开“自由”通商之路》一书,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内容相当丰富扎实的、有关 19 世纪 30 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进行探研的图景。这幅图景,显示了当时广州口岸以及澳门、伶仃洋的中西经贸往来情况;说明了当时长期居留广州口岸的各色西人,在广州及东南沿海,对我国社会经济进行的各种探查活动;介绍了这些西人在探查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其中,既有对显露在这些西人言行中的“侵略的西方”的深刻提示,也有对显露在这些西人言行中的“先进的西方”的客观展示。既有作者对历史事实的积极发掘,也有作者基于历史事实而提出的具有新意的学术见解。例如,为了较清晰地展示与当时在华西人探查活动有关的背景,作者对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按该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基本政策、具体内容等几个层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说明,指出这一内涵复杂的体制尽管具有一定对外“开放”的色彩,但这种“开放”实际上还不是一种近代意义的“开放”,时至鸦片战争前夕,面对西方日形强化的冲击,这种管理体制已失去了有效的作用(见该书第一章第一节)。这种分析,拓宽了对鸦片战争前广州外贸管理体制认识的视野,对这一体制的性质,作者也提出了带有新意的看法。还有该书对 19 世纪 30 年代广州口岸中西贸易规模的定量说明(见该书第一章第二节)、对当时西方在广州口岸投资状况的定量说明(见该书第一章第三节)、对当时广州口岸中西交往中发生的主要变化,包括该书第二章对东印度公司特权取消后“自由”商人力量崛起的分析、对伶仃走私基地的说明以及对当时澳门地位功能变化的说明等等,作者在书中都作出了富有开拓性的分析介绍。围绕 19 世纪 30 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查问题,作者还在书中对当时在华西人所具特征、对他们探查中所

建立的信息来源渠道、所运用的手法、所进行的重要活动、探查中的行为方式等，均进行了扎实而具有新意的分析说明（见该书第三章）。就当时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所进行的研究方面，作者在该书中也对当时在华西人针对中国状况，为实现“自由”通商而推出的主要行动策略、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与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一些突出特征的看法等等，也都进行了较系统充实的分析介绍（见该书第四、五章）。总之，全书内容于我们加深对当年具有“双重性的西方”对华具有“双重性挑战”的认识，加深对鸦片战争前夕中西碰撞状况的了解，加深对近代中国开端的了解，都是甚有裨益的。

不断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古代中国走向近代中国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和演进问题，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双重挑战以及中国的回应问题，不但仍然大有文章可做，而且大有文章要做。

学术神圣。神圣的学术事业，呼唤后继有人，呼唤新一代学者继往开来，青出于蓝。郭小东同志是一位谦虚谨慎、勤奋好学、有志于献身神圣的学术事业的年轻学者。他的这部著作，尽管还有其不足之处，他所研究的这个课题，也还有许多方面，包括各种“新问题”需要展开和探索，史料方面，亦还有许多“新材料”，有待发掘。我渴望小东同志再接再厉，继续前进，在神圣的学术领域做出新的贡献。我更渴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能继承和发扬陈寅恪大师“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的治学大旨，以严谨求实的态度，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写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著作来。是为序。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口岸中西经济交往	
基本状况	33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33
一、广州外贸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	34
二、广州外贸管理体制的基本政策	40
三、广州外贸管理体制的具体内容	51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夕中西贸易基本状况	64
一、西方对华贸易总体规模变化状况	64
二、主要进出口商品贸易量变化状况	75
第三节 西方势力在广州口岸投资活动的基本状况	86
一、西方势力在华放款情况	86

二、西方势力在广州口岸的直接投资情况	98
第二章 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口岸中西交往	
方式的变化	111
第一节 伶仃走私基地的形成和膨胀	111
一、伶仃走私基地的成因	112
二、伶仃走私基地的膨胀	117
三、伶仃走私基地的功能	124
第二节 英国对华贸易的“自由化”	129
一、东印度公司及其对华贸易特权的取消	129
二、散商与东印度公司区别之一：经营 运作的支撑点不同	134
三、散商与东印度公司区别之二：经营 活动利益取向的不同	137
四、散商与东印度公司区别之三：推销 英国工业品的态度有所不同	143
五、散商与东印度公司区别之四：对华 通商中采用的具体策略有所不同	149
六、散商与东印度公司的区别之五：对华 冲击中的具体行为方式有所不同	153
七、散商与东印度公司区别之六：对英国 政府的依赖程度不同	156
第三节 澳门在西方对华交往中地位、功能的变化	162
一、澳门经济地位、功能作用的变化	162
二、人口结构的转变，使澳门进一步 成为华洋杂处的区域	169
三、伴随着地位、功能变化而发生的 资本、产业结构变化	173

第三章 鸦片战争前夕来华西人对中国社会

经济的窥探·····	183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夕在华西人概况·····	184
一、鸦片战争前夕来华西人数量变化·····	184
二、常住广州口岸的西方商人群体·····	190
三、常住广州口岸的其他西人群体·····	202
四、常住西人在对华探研中的基本共性·····	212
第二节 在华西人在广州口岸地区的探查活动·····	217
一、不断加强的对华探查·····	218
二、直接接触华人：在华西人探查活动的 基本手法之一·····	222
三、收集中文资料：在华西人探查活动的 基本手法之二·····	235
四、勘测沿海水文航路：在华西人探查 活动的基本手法之三·····	242
五、秘密收集情报：在华西人探查活动的 基本手法之四·····	245
第三节 在华西人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探查活动·····	250
一、30年代的几次主要探查活动·····	250
二、西方势力在内地探查中的行为方式特征·····	261
三、西方势力在内地探查的几个主要方面·····	271
第四章 实现对华“自由”通商主体方案的策划·····	280
第一节 打开中国大门，实现对华“自由” 通商基本策略的谋划与推行·····	280
一、“对等”交往策略·····	281
二、“沉默政策”·····	298
三、炮舰政策·····	310

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的先声(上)	331
一、不断高涨的“签约”之声	331
二、关于治外法权	342
三、关于割据居留地	365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的先声(下)	378
一、“五口通商”的前期准备	379
二、“协定关税”的先声	398
三、取消公行制度的前期准备	418
第五章 对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研究	441
第一节 对中国人口特点的研究	441
一、西方世界对中国人口规模的怀疑	442
二、30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人口的认识	447
三、马尔萨斯理论在中国的最早运用	453
四、对华人口分析中所暴露的“侵略性”一面	458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中一些基本特点的研究	464
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缓慢性、停滞性	465
二、关于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增长方式的手段特征	473
三、对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停滞不前的原因分析	484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制度中一些重要特征的研究	490
一、在华西人关于中国经济运行中连带 责任制度的论述	490
二、对在华西人有关连带 责任制度认识程度的分析	497
三、在华西人关于中国土地私有产权清	

晰度特点的论述.....	501
四、对在华西人有关土地产权清晰度问题	
认识程度的分析.....	506
参考书目	511
后 记	519

绪 言

19 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历史演化中一个值得加以注重、须予深入研究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大清帝国的国势在各种内部因素的作用下进一步转向衰落的时期;是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后对华扩张的能量进一步加强的时期;是继长期积淀的中西矛盾、经长期发展的中西冲突加速激化的时期;是西方势力为实现对华“自由”通商这一目标展开最后冲刺的时期;是貌似强大的清王朝在对西方的交往中陷于更为严重的被动局面的时期;是中国传统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在西方势力的长期抵制破坏下濒于全面崩溃的时期;总之,这是西方势力为打开中国大门而进行的各种冲击活动加快升级的时期。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作为西方势力对华冲击“尖兵”的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查研究也进一步加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西方势力对华冲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19 世纪 30 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研,适应了西方势力进一步加强对华冲击的需要,与鸦片战争的发动以及战后带来的后果之间有着至为紧密的联系。这种探研活动,使西方势力对打开中国这一巨大市场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对西方势力加快打开中国大门实现对华“自由”通商的步伐起到了重要

的推波助澜作用。这种探研活动，使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鸦片战争前夕得以更有效地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从而能够对华发起一场准备更为充分的战争。这种探研活动，在西方势力实现对华“自由”通商有效突破口的物色上、在打开中国大门的有效途径的选取上、在通过战争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的择定上、在战后所要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重要条款的确定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探研活动，因其对中国基本国情、经济特征方面的了解、辨析，也为西方势力在鸦片战争后对华经济冲击的进一步展开做好了一定的前期准备。

19世纪30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探研的另一个值得注重的地方，就是当时从事探研活动的在华西人身份上的特殊性以及与这种特殊性相联系的他们在对华探研中所具有的特殊之处。与早于他们来华的耶稣会士等西人相比，19世纪30年代在华西人所具有的“侵略性”和“先进性”这双重性质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这些以英人为主的来华西人，不但打开中国大门，把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欲望更为强烈，而且，他们看待中国事物的眼光，分析评价中国事物的标准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时期的来华西人，他们是以近代大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新眼光、新标准来看待事物的。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鸦片战争前所有来华西人中分析看待中国事物上具有最高水平的群体。在他们眼中，中国传统经济与西方近代经济的差异已变得相当清晰，中国传统经济的落后性、特殊性也能在他们的有关分析中得到相当明显的反映，这是以前的耶稣会士等所做不到的。另方面，与鸦片战争以后的来华西人相比，他们分析中国事物的条件、看待中国事物的心态也有所不同。与鸦片战争后来华西人那种在不平等条约的保障下俨然以“至尊至贵”的身份在中国活动，能对中国国情进行称心如意

的探查，能以趾高气扬、高高在上的心态看待中国事物这种状况不同，19世纪30年代的在华西人尽管已是以一种相当鄙视的眼光看待中国，但他们心目中自认对中国所拥有的优势毕竟尚未曾通过战争以及随后的工业品大规模倾销而充分地展示在清政府面前，他们在中国毕竟尚未能得到不平等条件的保障，他们的在华活动范围仍被限制在广州口岸的指定地区，仍被作为滞留在中国大门口的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查也只能用一种较为曲折的方式进行。他们在热衷于尽快打开中国大门，想方设法地为早日实现对华“自由”通商出谋划策的同时，也毕竟只能以一种相对尚未充分膨胀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心态看待中国的事物。而且，作为身处中国大门口的探视者，他们也不可能像鸦片战争后的来华西人那样，以一种“太上皇”的身份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到中国内政之中，而是基本上仍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看待中国的一般性经济现象，这又使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看法带有一定的与鸦片战争后的来华西人不同的地方。因而，从通过中西比较以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特征这一角度讲，19世纪30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提出的看法、观点，也有其较特殊的可供参考之处。

19世纪30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研，对鸦片战争前后西学东渐之势的不断加强，对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不但在于他们在30年代时用中文刊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并大英国人事略说》、《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刊物、书籍在鸦片战争前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不但在于30年代在华西人中的郭士立、马儒翰、裨治文、伯驾等都直接参与了鸦片战争后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从而为西方冲击、影响的长驱直入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不但在于30年代的在华西人中，特别是一批作